

跨越山海的爱国星火

——菏泽“面人郎”与马来西亚龙运铁矿抗日大罢工

本报记者 王振宇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山东卫视8月25日晚播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《面人》,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在马来西亚(时为马来亚),点燃这次抗日烽火的中国农民中的抗日骨干力量,则有许多是来自菏泽鲁西新区马岭岗镇解元集村(现为解北解南两个行政村)一带的“面人郎”。

在马来西亚拍摄的电视纪录片《家在马来西亚》第五部第三集《龙运与北加华人的故事》中,数位铁矿老工人通过口述,回顾了龙运铁矿的发展历程,以及华人常天绪带领乡亲们开采铁矿的过往。

此处所提及的铁矿,便是解元集村居民口中常说的“铁山”。而常天绪,则是解元集村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走街串巷的“面人郎”。解元集村的乡亲们,以及后来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的众多“面人郎”,正是在跟随常天绪前往马来西亚龙运铁矿做劳工之后,才逐步开始接触并接受进步思想,进而投身革命事业的。

《山东省志·侨务志》大事年表中,有两条相关记载:

1933年,常天绪两次回山东菏泽老家招募工人,其中在菏泽、定陶县招工500人,在河南、河北邻山东地界招工320人。

1937年7月7日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,海外华侨当即行动,全力支持抗战,菏泽县旅马来西亚华侨常天绪经营的天绪公司近1000名华工集体辞职,拒绝为日本人开采铁矿石。

常天绪,堪称解元集村的一位传奇人物。

据村中老人回忆,常天绪出生于清朝光绪末年。彼时的中华大地,内有战乱纷扰,外有列强欺凌,朝政荒废,国运日渐衰微,正处于时代更迭的动荡时期。

“天子无福民遭难。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鲁西南地区水、旱、蝗、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。解元集村的乡亲们大多生活在困苦之中,许多家庭因生计无着,被迫卖儿鬻女,外出逃荒乞讨。

常天绪家中共有兄弟三人,他排行第三。因自幼皮肤黝黑,村里人都称他为“三黑”。

据村中老人讲述,年少时的“三黑”便极具个性。在旧社会,穷苦人家的生活常常食不果腹,由于家中时常断粮,年幼的常天绪经常挨饿。有一天,常天绪实在饥饿难耐,便偷偷钻进镇上一户大户人家的庄稼地里,掰取玉米充饥。不料,此事被一位好事的村妇发现。她揪住常天绪的耳朵,将他从玉米地里拉了出来,当着众人的面,厉声斥责,辱骂他日后难成大器。

遭受责骂后,年幼的常天绪内心十分气愤。但他深知自己有错在先,虽未当面辩驳,心中却暗暗立下誓言:日后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,让那位责骂他的村妇刮目相看。

起初,常天绪四处奔波,靠出卖苦力、打零工维持生计。后来,他找到镇上擅长面塑技艺的好友杨鸿友,跟着他学起了捏面人的手艺。在杨鸿友的悉心指导下,加之常天绪自身心灵手巧,他很快便掌握了捏面人的诸多技巧。一团团普通的面团,在他手中经过捏、搓、揉、掀等一系列动作,再用小竹刀巧妙地点、切、刻、划,片刻之间,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应运而生。

自此,常天绪开始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以卖面人为生,成为一名游走四方的“面人郎”。

二

成家之后,常天绪的家庭负担日益加重。然而,走街串巷捏面人所得的收入,仅能勉强维持他个人的温饱。家中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,下有嗷嗷待哺的子女亟待抚养,这迫使常天绪开始思索其他维持家庭生计的途径。

1928年,是常天绪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。这一年开春,常天绪与穆李寨的面塑艺人李俊兴、李俊福兄弟,以及解元集村的杨鸿友等10余名“面人郎”,收拾行囊,告别家乡,一同踏上了前往马来西亚卖艺的漫漫旅程。

彼时,常天绪、李俊兴等人并未料到,此次外出卖艺的经历,竟会被载入菏泽面塑艺术的发展史册。后来,每当提及菏泽面塑艺术的发展历程,人们总会说起常天绪、李俊兴等10余位面塑艺人一同前往马来西亚卖艺的这段往事。

此后,李俊兴历经数十年艺术生涯的磨砺,最终成为一代面塑大师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多次参加全国及全省工艺美术品展览会,1957年被国务院授予“全国老艺人”称号。而常天绪则从一名“面人郎”成功转型,在马来西亚成立天绪公司,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华侨。他因在龙运地区开采铁矿而声名远扬,被当地人誉为“铁王”。

三

常天绪、李俊兴等人离开家乡后,历经诸多磨难。他们一边沿途捏制面人售卖,一边跋山涉水,经过数月的艰辛跋涉,最终抵达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丁加奴(现称马来西亚登嘉楼)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丁加奴先是沦为英国的保护领地,后又成为英国的马来属邦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统治。

20世纪初,大量华人在丁加奴聚居,以小本经营维持生计。加之当地气候温暖,为常天绪等人捏制和售卖面人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因此,抵达丁加奴后,他们凭借精湛的面塑技艺,很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。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不知不觉间,一年的时光悄然流逝。不久,身处异乡的10余名“面人郎”中,有人开始思念家乡的亲人。他们从各地汇聚到一起商议,最终决定:李俊兴、李俊福兄弟以及杨鸿友等人返回故乡,而常天绪则与李本化、李本纯3人决定继续留在马来西亚。

据解元集村的面塑艺人杨鸿友生前回忆:常天绪性格极为倔强,一旦认定某件事,便必定要做出一番成绩。他的计划是,下定决心在海外打拼数年,待积攒足够的钱财后,便返回故乡,翻修家中的土坯房,在村里争一口气。

此外,与其他“面人郎”不同的是,常天绪生性豪爽仗义。在当地,他凭借面塑技艺结交了众多挚友,其中甚至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。这为他日后的命运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随后的几年里,常天绪在马来西亚四处闯荡,如鱼得水,逐渐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。到了1933年,他来时运转,放弃了捏面人的手艺,在马来西亚创办了天绪公司,转而成为日本人经营的龙运铁矿的矿区工头。

提及这段经历,解元集村有人说,常天绪曾与马来西亚的国王结交为友,外出时,即便是马来西亚的警察见到他,也要向他敬礼。也有人说,常天绪曾救助过一位当地人,而此人后来竟成了马来西亚的高官。还有人说,常天绪结识了一位英国人,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,这位英国人见常天绪为豪爽、重情重义,便将自己经营的铁山一处矿区赠予了他。

由于岁月久远,这段往事已无从考证。但无论如何,外出闯荡不到5年,常天绪便从一名“面人郎”摇身一变,成为日本政府经营的龙运铁矿的矿区工头。这不仅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,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成为铁山矿区工头后,常天绪的公司规模不断扩大,急需招募工人。同时,他也怀有帮助家乡人维持生计的想法。于是,1933年至1935年,常天绪先后两次返回山东菏泽老家招募劳工。

四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,但在历史上,它也是一条桀骜不驯、时常泛滥的河流。菏泽地区因地处黄河中下游,数百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乡亲们曾多次因黄河洪水泛滥而流离失所。

常天绪回乡招工的这一年,汹涌的黄河在一个名为二分庄的地方决堤,洪水直冲菏泽,水位一度与护城堤持平。解元集村位于菏泽城西18里处,首当其冲遭受洪水侵袭,当年的庄稼颗粒无收。村民们面临着衣食无着的困境,一些家庭不得不外出逃荒乞讨。

此时,常天绪回乡招募劳工,恰好为正为生计发愁的乡亲们提供了一条挣钱养家的门路。当村民们得知常天绪衣锦还乡并要招募劳工的消息后,纷纷奔走相告。消息迅速传播开来,解元集村的一些青年纷纷找到常天绪报名。

没过几天,附近桥李、安顿庄、吴拐等村庄的许多年轻人,也在得知消息后赶来报名。一时间,常天绪家中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那一年,解元集村周边村庄有上百人选择跟随常天绪前往马来西亚铁山务工,仅解元集村就有70余名劳工。

跟随常天绪外出的这些人当中,有不少是此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艺的“面人郎”。常天绪的堂兄常合民(又名常天铎),自幼便跟随村里的面塑师傅学习技艺,在前往马来西亚之前,他的面塑技艺已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新中国成立后,常合民曾在北京工作,其间重拾面塑旧业,素有北京“面人常”的美誉。

杨鸿友当时刚结婚不久,有过一次前往马来西亚的经历,他盘算着在家乡靠捏面人谋生,不如去铁山务工挣钱多。但他父母早逝,家中无老人需要赡养,也无子女需要抚养,他若外出,家中便只剩下妻子王云一人,杨鸿友对此放心不下。于是,他与妻子王云商议后,决定两人一同跟随常天绪前往铁山务工。在此次外出的人员中,王云是解元集村唯一的女性。杨鸿友的儿子——南京退休干部杨守林回忆道:“母亲曾跟我讲过,当年去马来西亚时,还乘坐了大轮船。她说自己是小脚,上船时需要攀爬软梯,她无法独自上去,上面有人拉着她的手,下面有两个人向上推她,这才登上了轮船。”

村中老人表示,解元集村及附近村庄外出的劳工,是分批前往马来西亚的。最早跟随常天绪出发的人,路费全部由常天绪垫付。后来出发的人,有些因没有足够的路费,便依靠捏面人的手艺,沿途售卖面人赚取路费,最终抵达马来西亚。

受此影响,从1933年到1935年的几年间,菏泽、定陶一带许多生活无着的乡民,纷纷前往马来西亚投奔常天绪,以维持家庭生计。据山东省史志资料记载,定陶县徐庄徐新中等8人就曾一起结伴到马来西亚投奔常天绪。

常天绪两次回乡招工,共在山东、河南及河北地界招募劳工820人,仅在菏泽、定陶一带就招募了500余人。

此时的常天绪,已然实现了从“面人郎”到“老板”的华丽转变。同时,经过数年在海外打拼,他也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。

回乡招工的当年,常天绪实现了自己的心愿,将家中被毁的土坯房进行了翻修,建起了高大的青砖瓦房。这座房屋在当时堪称解元集村最好的建筑。1937年,鲁西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7.0级大地震,常天绪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当晚因留宿娘家而不幸遇难,而他们新建的房屋,除后墙出现一道轻微裂缝外,主体结构并未受到严重损坏。

村中老人常连贵在世时说:“常天绪老家的妻子,村里人都称她为王三姐。王三姐既心灵手巧,又勤劳能干。倘若大地震发生时,她和孩子住在自己家中,或许她的命运就会被彻底改变。”

然而,命运从来没有“或许”可言。一个世纪过去了,常天绪的老屋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解元集村。它宛如一位老者,向后人诉说着发生在它身边的故事;又更似一件古董、一件文物,默默见证着村子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变迁,以及众多家庭的兴衰荣

辱。

五

据史料记载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,日本人就已掌控了马来半岛的铁矿开采产业。

龙运铁矿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马来西亚经营的规模最大的铁矿场,由日本政府直接投资运营。该铁矿雇用华工共计2700余名,其中山东籍800余人、浙江温州籍700余人、广东籍700余人、福建籍500余人。据估算,该铁矿每日产铁一千余吨,年产量约40万吨,平均每周有3艘大型货轮将铁矿石运往日本本土。若日本将这些铁矿石用于制造军火,每小时可制造子弹约4.5亿颗。

在矿山上,日本人对矿工极为苛刻。他们逼迫矿工拼命劳作,然而,矿工们每日挣得的工资却难以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,有时还会遭到日本工头的欺凌与辱骂。部分矿工因生病上班迟到,或因过度劳累累倒后,竟会被矿山警卫拖出去毒打,打得遍体鳞伤、奄奄一息。还有一些矿工病死后,被日本人丢弃在山外的空谷中暴尸,或被浇上汽油焚烧,场面惨不忍睹。

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矿区工人的强烈愤慨。在菏泽一带的劳工抵达铁山之前,矿区的劳工们就曾因日本人的暴行展开过英勇抗争。为维护自身权益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矿工们曾成群结队、手挽手地愤怒抗议,震慑了日本矿警的嚣张气焰,迫使他们提高了矿工的待遇。这是龙运铁矿劳工抗日斗争史上最早的一抹亮色。

幸运的是,由于常天绪在龙运矿区担任工头,从山东、河南等地跟随他前来的800余名劳工,抵达铁山后并未遭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。劳工们每月月底都能按时领到工资,生活基本无忧,有时还能读到国民政府及当地出版的一些报纸。而且,解元集村的许多劳工所享受的各项待遇都比较优厚,大部分人都当上了铁山矿区的班组长。杨鸿友的妻子王云及部分当地妇女,则在矿区从事洗衣、做饭等杂务工作。

5年前,解元集村劳工汪林雷的儿子汪金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那时,我们村跟随常天绪前往铁山的部分劳工行事较为‘随意’。有些年轻人会穿上道士服饰,时常‘冒充’大师,用所谓的‘法术’为外国人看病;还有一些年轻人生性好斗,与当地人或其他工友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时有发生。任冠禄身材高大魁梧,打起架来,好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此外,桥李村的李兰兴在铁山以好斗闻名,在矿区一提起‘山东李小五’(李兰兴),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”

李兰兴在家中排行老五,前往铁山务工那年,他年仅17岁。他与大哥李兰冬,以及村民李兴齐、李兴斗、李保寺、李兰田等10余人,曾跟随镇上的杨鸿友学习面塑技艺。经由杨鸿友引荐,他们在常天绪处报名后,来到了铁山。

当时的李兰兴年少气盛,又学过几年武术,出手既狠又快,矿区内很少有人敢招惹他。因此,在铁山,马来西亚当地民众及矿山来自各地的劳工,都对山东人怀有几分敬畏。

杨鸿友的儿子杨守林于1935年7月在新加坡出生,“父亲当时是一名班组长。在铁山,我们村前往务工的人员中,只有父亲和常天绪两人携带家眷。常天绪在当地娶了一位福建籍女子为妻,当时已育有一子,小名叫‘狗’,比我大一岁。”据杨守林回忆,“父母常提起,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。母亲还说,常天绪的妻子是大脚,思想比较开明,平时穿裙子。而母亲那时候穿长裤子,常天绪的妻子经常拿着一根小棍子,挑起母亲的裤腿,让别人看母亲的小脚,以此逗乐母亲。”

关于常天绪担任工头时的印象,后来回国的劳工们在生前大多表示,常天绪为人仗义、待人宽厚,与当地人相处融洽,与劳工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,彼此之间无话不谈。他公司的劳工们,无论是来自老家一带的,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,工作都十分勤恳卖力。当时矿区的生产形势良好,有些矿工偶尔手头拮据,向常天绪借钱,他总是十分大方,从不拒绝。

工友们见状,迅速将日本监工的尸体抬起来扔进矿车,用矿石将尸体掩埋后,将矿车运走,处理掉了尸体。

六

1937年7月7日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,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不久后,铁山矿区开始频繁出现一些神秘人物,他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,深入矿区居住地慷慨陈词:“日本人侵略中国,你们却在为日本资本家开采矿山,他们将铁矿冶炼成钢锭运回日本,制造枪支大炮,用来杀害我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……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,不要再做日本资本家的奴隶。”

这番充满激情的动员,迅速点燃了工人们的爱国热情。在爱国华侨的组织下,常天绪及解元集村的许多劳工都积极参与到抗日宣传活动中。

由于大部分劳工没有文化,起初,他们只看到工头常天绪与开展抗日宣传的华侨们频繁秘密接触,却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“小日本打到中国去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不过,常合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等人却颇具见识。一段时间里,常合民跟随堂兄常天绪,与抗日华侨接触,逐渐明白了许多爱国道理。

段振民曾在镇上的小学堂学习过“四书五经”,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。段振东曾参加过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,后来在一次军阀混战中,部队被打散,他在无法找到部队的情况下,返回了老家。在听取了抗日华侨的宣传以及常天绪的秘密动员后,他们心中迅速燃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火。

在常合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等人的解释下,大家才知晓,日本侵略者当时已经打到了自己的家乡,他们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,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生死未卜。得知这些情况后,劳工们纷纷觉醒,内心充满愤怒,决心与日本侵略者势不两立,许多人摩拳擦掌,恨不得立刻返回国内参加抗战。

但他们也发现,由于龙运铁矿地处北马偏远地

区,且当时柔佛州西北境由日本人经营的第二大铁矿——山合株巴所辖铁矿刚刚爆发过大罢工,因此,日本人对龙运铁矿矿区的管控与防范日益严密。他们不仅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,还在矿山上加强了武装警备队的力量,增派了更多的日本监工。同时,他们禁止所有华文报纸和书籍进入矿区,以防矿工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。矿工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,有时在一起交谈,都会遭到日本监工的呵斥与打骂……

然而,日本人的严密管控,终究无法压制住劳工们心中的憎恨与怒火。1938年2月中旬,闻知东南亚的华侨抗日英雄庄惠泉秘密来到龙运铁矿。他与当地光华学校校长白硅(据马来西亚相关史料记载,光华学校最初由常天绪投资兴建)、工头常天绪一同积极奔走,联络并动员矿区其他近20名工头,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《南洋商报》上刊登启事,明确表示“从此誓与小日本完全断绝关系,不再供敌人使用”。

庄惠泉、白硅、常天绪等人共同召集华工头目及矿区店铺的华商,进行宣传动员。众人情绪激昂,纷纷表示支持罢工抗日。常天绪负责动员其他工头,再由工头动员手下工人。一名名叫肖秋辉的华商积极劝说其他商人,关闭了为铁矿供应物资的店铺,不惜牺牲自身利益,以支持抗战大局。

在常天绪的带领下,解元集村的常合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、李兆谱、王林瑞、杨鸿友、常朝贵等人,以及其他村庄的部分劳工,都成了组织罢工的核心骨干。他们利用担任班组长的便利身份,秘密分头深入矿区群体,一边向矿工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,一边组织矿工们在矿中开展破坏行动。他们有时会组织矿工将棉纱偷偷缠进机器,有时则拆卸设备零件并扔进山沟,以此迫使矿山机器停止运转。

罢工前一天,常合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等几名劳工在做工时,恰好身边只有一名日本监工。这名日本监工身材高大肥胖,平日里作威作福,此前曾有一名河南籍劳工被他暴力殴打折磨致死。

回想起众多同胞无辜惨遭杀害的情景,大家怒火中烧,决定趁机除掉这个恶魔。常合民上身假扮与日本监工套近乎,段振民则悄悄绕到监工身后,趁其不备,举起手中的铁铲,狠狠砸向他的后脑。这名日本监工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呻吟,便当场毙命。</